

第六章 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

張亞中、苗繼德

一、基本概念

(一) 定義與研究對象

要了解何謂國際政治經濟學，首先就必須要知道何謂政治經濟學。政治經濟學的出現與小規模商品生產與貨幣出現、物價波動、有些生產者陷於債務，原始公共關係開始解體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如我國的孟子（西元前 327~289）與西儒柏拉圖（Plato，西元前 428~347）與亞里斯多德（Aristotle，西元前 384~322）就曾說明少量商品的生產而來的不穩定並為原始的社會尋找克服的方法。而政治經濟學一詞最早在西元 1615 年首先由蒙特奇雷丁（Antoyne de Montchretien，1575~1621）所提出，其認為政治經濟學是研究國家經濟的管理，如何累積國家財富的經濟理論，試圖以經濟活動為手段來增加國家的力量，這也正反映出當時重商主義盛行的氣氛，足見政治經濟學之萌芽與重商主義的興起有相當的關聯性。（Staniland,1985）

而所謂政治經濟學是研究政治與經濟交集的學問，也就是研究「國家」與「市場」的互動學問，而國際政治經濟學則是將上述的研究焦點延伸到國際層面（Maddock, 1992: 107）。學者古茲尼（Stefano Guzzni）更認為國際政治經濟學本身是針對華茲（Kenneth Waltz）提倡較有系統、範疇較為確定的現實主義模式所產生的一種反動，這個反動有部分是涵蓋在華爾茲的現實主義模式，部分則是反對華爾茲的現實主義模式。（Guzzini,161）而學者克蘭（Geogre T. Crane）和阿瑪偉（Abla Amawi）則更認為政治經濟學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國際關係理論中占主導地位的現實主義典範（paradigm）的已知缺陷做出反應。（Geogre T. Crane & Abla Amawi,1997:4）也因此可說明此一新研究領域為何有時包含在傳統的國際關係範疇之下，有時卻又取代傳統的國際關係而被當成完全不同於傳統國際關係的另一種學科。

對於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定義與主要分析內容，學者們的看法主要可分成下列二種：

第一種是以美國學者為主，代表的是美國學者吉爾平（Robert Gilpin），他認為國際政治經濟學是一門分析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的「關聯性」，即彼此之間如何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學科。因此，其分析的問題可歸納為三個層次的問題。一是關於市場經濟增長的政治性原因及作用；二是關於經濟上的變遷與政治上變遷的相互關係；三是國際經濟市場對國內經濟的重要意義。（Gilpin, 1987）

第二種是以歐洲學者為主，代表的人物是英國學者斯特蘭奇（Susan Strange）。她將國際政治經濟學視為是一個了解國際政治的「分析架構」，從結構上去分析任何一種政治機構對市場的影響，或是市場力量對政治機構的影響。因此，其主要的分析對象為全球生產、交換與分配的體系，以及這些體系所反映出

的價值觀對國家、社會與經濟秩序的影響。(1994:16-17) 她更認為九〇年代的三種變化推動著世界格局的發展，一是冷戰的結束；二是經濟的全球化；三是第三世界的瓦解，她認為對這三種重大變化傳統的國際關係理論無法提出完善的解答，而國際政治經濟學則提供國際關係研究的另一個視野。

(二) 國際政治與經濟互動的形式

在政治與經濟的互動方面，國際政治經濟學者斯佩羅 (Joan E. Spero) 認為此兩者的互動大體以三種面貌呈現：(Spero, 1997)

第一、政治的框架會決定經濟的利益分配。因此，國際經濟體制的各種制度和運作機制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國際政治體制，國際範圍內的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國際政治、外交與軍事安全因素的制約。

第二、國際政策的決定過程中政治因素與經濟相互影響。國際經濟上的優勢是實現某種國際政治目標的手段；國際政治政治上的優勢更是獲取經濟利益不可缺少的助手。

第三、國際經濟關係就是國際政治關係。經濟實力是國際權力的重要泉源，財富的獲取是國家利益的重要目標；主權國家的衝突中經濟利益的得失是國際衝突是否加劇的重要因素。

另一位國際政治經濟學者金德爾柏格 (Charles P. Kindleberger) 從另一個角度來闡述國際政治與經濟的相互關聯。他提出了國際政治經濟學三個研究領域及七個重點議題。

三個研究領域為：各國國內經濟與國際政治、各國國內政治與國際經濟、以及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之間的相互關係。七個重點議題為：(1) 對國際範疇內政治與經濟互動的基本原則的探究；(2) 對當代資本主義現狀及發展趨勢的研究；(3) 對當代國際秩序的研究；(4) 對不發達問題原因及其解決方法的研究；(5) 對國際組織與國際經濟合作的研究；(6) 對國際貨幣體系、貿易與投資、經濟援助與技術轉移等重要國際經濟問題的研究；(7) 對各國外交政策中經濟因素的研究。(Kindleberger : 1970)

且隨著國際情勢的日趨複雜，現今國際政治經濟學不只僅僅研究國際政治和國際經濟行為體的活動，一些非國家行為者，例如區域經濟體、全球資本市場、跨國公司、甚而至非政府組織都在國際政治經濟學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另外，在必要的時候，也必須探就某些國家的國內問題，以便理解國家國內政治與經濟結構在其運行過程中對國家的對外政策和對外行為的影響。(Dougherty & Pfaltzgraff, 2001: 417)

國際政治經濟學已經是一門認識國際關係必要的知識，特別是在冷戰結束後的經濟全球化世界，國際政治經濟學更成為探究全化的一門必備學科。本章著重在理論面的介紹，將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區分為重商主義 (Mercantilism, 又稱之為經濟民族主義)、經濟自由主義 (Economic Liberalism) 與 結構主義 (Structuralism)。茲漸次介紹如後。

二、有關重商主義的論述

重商主義是國際政治經濟學中非常重要的看法，也是首先形成的學說。它的發展與十六世紀歐洲大陸民族國家的興起有關，幾世紀以來，隨著其他國際政治經濟學觀點（如自由主義）的發展與國際現世的演變和國際貿易的發展，重商主義的內涵也不斷演變。人類歷史上重商主義的發展大致上可分成三波：第一波是十七、八世紀盛行於西歐，由政府採取主動強調統一、權力與財富的重商主義；第二波是以十九世紀李斯特（Fredrick List）為代表，而強調國民經濟（national economy）統一與發展的德國保護主義；第三波則是二十世紀面對金本位制的崩潰與經濟大蕭條，而由波蘭義（Karl Polanyi）與凱因斯（John M. Keynes）所喚起的福利國家政策與接踵而來的新保護主義措施(Sylvan, 1981: 375-393)。上述三波重商主義又可分別稱為「追求權力的重商主義」(power mercantilism)、「追求發展的重商主義」(developmental mercantilism)和「追求福利的重商主義」(welfare mercantilism)。

（一）重商主義

重商主義在追求權力方面，是基於下列幾個基礎命題：(1)、財富是獲得權力的絕對的基本手段，不管是為了安全還是為了侵略；(2)、權力對獲得和保持財富是基本的有價值手段；(3)、財富和權力都是國家政策的恰當終極目標；(4)、雖然在特定的環境之下，可能有必要為了軍事安全的利益以及長遠繁榮的利益而犧牲暫時的經濟利益，但這兩個目標從長遠來說是和諧一致的。(Viner, 1948: 10)

其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重視多由外國輸入金銀，後期更傾向贊成國際貿易：因為當時認為貧富的標準不是在於生產力的高低也不是在於資源的多寡，而在於金銀的多少。在早期學者們主張「貨幣差額」，持「多賣少買」的觀念中「少買」的消極做法，購買會減少貨幣存量，銷售會增加財富；續而採取禁止貨幣輸出，鼓勵囤積貨幣，且藉由海盜行為來搜括海外的資源與資金。後期則主張發展「貿易差額」，改變以往對國際貿易的態度，積極贊同國際貿易，但貿易必須是處於出超狀態。

第二、要向海外尋求殖民地：而其目的既不在「殖民」，也不要求「地」，而是希望在此尋求金銀，運回國內。

第三、重視人口的增加：理由有二，一是人口增加，就是從事海外貿易的人口增加；二是人口增加，則國內從事工業的人口也就增加，一旦如此，則國內財富就可增加。

第四、重視國家對經濟活動的干涉：由於上述的理由，因此，國家必須對經濟生活的各個面向加以干涉，以便累積金銀，增加國家財富。

總的來說，傳統的重商主義政策的目的並不是為了普通百姓過富裕的生活，而是為皇室累積金錢，以便增強國家的武裝力量，讓皇宮變得更富麗堂皇，使貴族能過得奢侈的生活。而且這時期的重商主義著重於國際貿易中貨幣流通層

面的探討，而不重視國際貿易中生產關係的探求，因此無法配合隨著英國的產業革命、美國獨立與法國大革命後產生的「新」國際情勢，而逐漸的末落。

（二）新重商主義

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時，英國已經快要完成工業化，而歐陸的大多數國家仍舊是農業國家或在工業化的早期階段，拿破崙戰役後英國超越了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與法國成爲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英國一躍成爲全世界頭號的軍事與經濟強國，倫敦成爲世界的金融中心，英鎊成爲全世界的準通貨，英國成爲全球的「工廠」。

與此同時，幾項象徵重商主義的法案在英國正式被廢除，使國際資本主義體系更進一步的擴張。如英國於 1846 年正式廢除穀物法案（Corn Law）¹、1849 年正式廢除了航海法（Navigation Acts）²與 1860 年英法貿易協定的簽訂，吸引了其他國家要求加入此一雙邊協定，並降低彼此的保護措施，雖然此時的關稅稅率仍然很高，但仍舊奠定了自由貿易的基礎，英國親自由主義人士更主張國家應對經濟採行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態度，自由貿易政策成爲英國獲得權力與財富最有效的政策，其他國家的產品受到英國產品強勢競爭下，紛紛採行重商主義式的政策以自保，英國的文化隨著其軍事與經濟力量正侵入世界各國。

這一時期的主要代表學者首推美國的第一任財政部長漢彌爾頓（Alexander Hamilton, 1755~1804）與德國的經濟學者李斯特。他們的基本論點是國家的生存、自主和安全是國家的最高政策目標，國家可以不惜花上任何代價去達成這些目標，工業化是達成此目標的必要手段。在工業化的過程中，先進的工業國家與後起的工業國家的利益並不一致，自由貿易對先進的工業國家有利，而對後起的工業國家不利，爲了順利達到工業化，後起的國家必須要「國家干預」與「貿易保護」。但是，爲如此主張重商主義的學者卻沒有看見，世界各國反而因此掉進了經濟鬥爭的命運，相互陷害，以鄰爲壑，最後弄得兩敗俱傷，更進而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生。

（三）策略貿易理論

十九世紀時，由於擁有軍事和經濟的主導權，英國得以於國際間採行自由經濟體系，但當英國勢力於十九世紀末期開始衰退之時，自由經濟體系亦隨之開

¹ 所謂穀物法案是指，一系列以高關稅限制外國穀物進口的法案，英國自十二世紀即有此傳統，1815 年拿破崙戰爭後國會使制定了穀物法案。這個法案的目的美其名是爲了保持英國的糧食自足，實際上是藉著限制穀物進口，以減少本國農民所遭受的外來競爭。農民與地主是國會議員的主要選票來源，因此這個法案的目的其實主要是保護農民與地主的經濟利益。

² 所謂航海法是指爲十七世紀中葉以後，英國政府所頒布一系列獎勵航海事業和海外貿易法令的總稱。其中尤以 1651 年所頒佈的法令最爲重要。其規定進口品只准使用英國船隻或原生產國船隻運輸，出口品只准許英國船隻運輸。在當時，荷蘭是歐洲貿易的最大轉運中心，各國貨物均使用荷蘭船隻運輸，因此該法令便直接打擊了荷蘭的航運業，並引起 1652 年的英荷戰爭，最後荷蘭戰敗，被迫承認此一法令。之後，英國政府又陸續頒布法令，確立英國船隻對於殖民地貿易和歐洲運輸英國產品的壟斷地位。此一法令一直施行至 1849 年倡導自由貿易後始廢除。

始衰退，第二波重商主義便開始興起。1930年代，受到全球經濟大蕭條的影響，工業化國家紛紛採行以鄰為壑的經濟民族主義政策，最後，非但無助於解決本身的經濟困境，反而使得經濟的困境日益加深，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生。高關稅壁壘、貿易保護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是導致二次大戰爆發的主要原因之一。二次大戰後的美國有鑒於經濟民族主義對世界和平的危害，美國與英國便重新建立新的國際自由經濟體系，即「**布列敦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美元成爲國際準通貨，紐約取代倫敦成爲世界「新」的金融中心。

布列敦森林體系並不是完全自由放任的經濟體系，而是依靠美國領導的機制，因此常被學者稱爲「**隱含式自由主義體系**」(a system of embedded liberalism) (Ruggie, 1993: 382-383) 又因爲這個自由經濟體制脫胎自凱因斯「政府應介入經濟運作」的理念，因此又被稱爲「**凱因斯妥協**」(Keynesian compromise)。與此同時，福利國家與凱因斯經濟學取代了**新古典經濟學派**(Neo-Classical School)，成爲政府奉行的圭臬，於是逐漸形成了一種相互衝突的經濟制度，在國際上是自由經濟體制，強調自由貿易的原則，政府不該干涉貿易活動，讓市場來決定一切。但在國內卻是強調政府爲了達成消除貧窮、穩定社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人民充分就業的目標等，政府應積極的介入經濟生活。

這個相互衝突體系的運作是否得宜主要是看美國的經濟情況，若美國的經濟情況不佳時，這個體系就有崩潰的危險。1940年代末、1950年代時因美國的經濟情況尚佳，因此體系運作得宜，世界達成了有史以來最長的經濟成長，但到1960年代末，因美國受到雙赤字(twin deficits)、大社會計劃與越戰的戰費支出的壓力，這個自由主義的國際經濟體制便受到了嚴重的壓力，1973年1月美國總統尼克森正式宣佈廢棄布列敦森林體系，使美元脫離金本位制，引進浮動匯率，自此之後，一股新保護主義升起，更進一步發展。

與此同時，戰後貿易型態轉向以工業化國家間的貿易爲主，貿易利潤分配的政治性色彩減少，因而使得先前重商主義者的立場已經站不住腳，再加上對於進口品的需求增加與生產的國際化，更使得舊式的重商主義除了對民粹主義者能形成吸引力之外，很難獲得廣大的認同。因而使得這些贊成保護主義的學者開始將重點放在特殊的工業領域而不再碰觸那些由各階級和區域利益結合的領域，例如勞工、農業與重工業。(Held, eds., 2000: 183)

學者克魯曼(Paul Krugman)把當代各國所採行的各種重商主義的措施，通稱爲「**策略貿易理論**」(Strategic Trade Theory)。克魯曼認爲策略貿易理論之所以在美國崛起，是自由派對雷根當選的反應。(Krugman, 1994: 247)

「策略貿易理論」的精隨在於一家公司能在母國政府的幫助下，能夠使其在該行業獲取競爭優勢。「策略貿易理論」建立在三種相互關聯的論述上，而其全部都指出政府對於經濟的干預，雖然相當可能會造成其他國家的損失，但是卻有助於改善自己國家的福祉。這三種論述爲：

第一、「**動態的比較利益原則**」：其與自由主義學者主張的「靜態的比較利益原則不同」，它認爲比較利益並不是固定的，是可以由國家和企業創造出來的，

若採取靜態的比較利益原則進行國際分工，將使落後國家的發展遠遠落後於先進的工業國家。因此，一個落後國想要迎頭趕上西方工業化國家，首先要克服的就是改善其比較利益與貿易條件。如二次大戰後的日本政府採行行政指導的方式和大企業密切合作，政府選出最有發展潛力、高科技的、能創造高就業率的產業，如汽車業、半導體等，給予政府補貼、信用保證和賦稅優惠，獎勵出口，創造貿易盈餘。日本的這套發展政策為日本的經濟發展奠定了基礎，使日本今日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貿易盈餘與債權國。

第二、「以眼還眼原則」：事實上，不論一個國家如何困難的創造自由貿易的議題與機制，其他國家仍然都會繼續在市場進行干預，因此，鼓勵這些國家朝自由貿易的方法，就是以眼還眼，一個國家介入貿易的威脅與現實，是阻止其他相同國家所必須的。(Thurow, 1993:245-258)

第三、「保護國內非技術性勞工原則」：由於一個全球市場的誕生，加上日本與東亞諸國採行「**出口擴張**」戰略的成功，因而許多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紛紛放棄以往以「**進口替代**」的戰略改以出口擴張，世界產品市場已經形成了供過於求的情況。再加上因先進國家技術變遷所導致的產業分布，因此，許多先進國家的非技術性勞工正面臨著第三世界國家的勞工競爭，為了保護這些勞工的生活，政府必須對那些來自其他國家的低技術產品加以限制，以便維護這些勞工的生計。

如果必須從策略貿易理論中，找出一個關鍵觀念，那便是一國要繁榮，就必須使某些產業的領先地位繼續保持或擴大領先差距，甚至於從無到有來培育這些產業。

策略貿易理論與重商主義的不同之處在於，第一、採行策略貿易的國家不再採取武力手段向外佔領殖民地；第二、策略貿易理論對產業的保護是選擇性而非全面性的，其保護對象僅限於特定產業部門，尤其是攸關國家發展、國家競爭力、國家安全、國民就業與國民福祉的部門。

而其相同之處在於政府在市場上依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國家以國家發展的名義介入經濟活動，以人為的方法替本國產品創造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優勢，並藉著許多**非關稅障礙**（non-tariff barriers）來抑制進口。

（四）重商主義對國際貿易的看法

總的來說，重商主義對國際貿易的看法有三：

第一、國際貿易是**零和遊戲**（zero-sum game）的競爭：主張重商主義的學者大多認為世界的經濟資源是有限的、固定的。因此，國際貿易是零和遊戲，一方之所得必為一方之所失。在一個充滿競爭的世界上，相對的獲益比相互獲益來的重要，因此各個國家都試圖改變國際經濟關係，以便獲取更多的「超額」利潤。

第二、國際貿易會帶來衝突：國際貿易會帶來經濟上的互賴，但這種互賴關係是不對稱的，因而使得經濟上的強國可以來影響弱者的經濟政策與外交政

策。因此，由國際貿易所產生的經濟互賴反而會增加一國的不安全，經濟上的互賴是不可取的。爲了達到國家安全，國家的經濟必須能自給自足，並且減少對他國產品與市場的依賴，爲了達到這個目標，主張國家必須將對外貿易置於國家安全的考慮之下。

第三、反對自由貿易：因爲自由貿易有利於工業化國家，而較不利於後進國家，因此主張高關稅；一方面可以保護國內的稚齡工業，另一方面也可增加政府的稅收。(Taylor, 1995:568)

三、有關經濟自由主義的論述

與重商主義思潮發展所不同的是，自由主義對國際貿易的基本看法是形成於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其後的學者大都是在此基礎之上略作補充，而並沒有重新建構其思想體系，且自由主義的經濟思潮一直被西方先進工業國家奉爲經濟準則，而加以推廣。

「市場機能」與「自由主義」(market function and liberalism) 一直以來均是經濟自由主義者所堅持的原則，從十八世紀以來，這兩種理念也一直支配著經濟自由主義理論的發展。自由主義的主要論點在於把人看做理性的經濟動物，市場是爲滿足人類的需要而自發產生的。一旦市場運行後，其便會依據自己的內在邏輯運作，而不需要人爲的幫助。儘管經濟活動也會產生外溢效益而會增加國家的力量和安全，但經濟活動的主旨卻是爲每位消費者帶來利益，自由貿易與開放市場將會爲每位消費者提供更好的服務與更便宜的商品。鑒於每位市場的參與者同時是消費者也是生產者，每個人理性抉擇的背後也促成了市場上各種力量的平衡，因此，市場是一個自我校正的平衡系統，任何不當的干預非但無助於市場的發展，反而迫害了市場內在的穩定性。因而，自由主義者反對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預，他們認爲來自政府的干預將會導致資源的誤置而無法發揮原有的效益。

(一) 經濟自由主義

傳統的經濟自由主義的思想體系可以史密斯 (Adam Smith; 1723~1790) 及李嘉圖爲代表。史密斯在他 1759 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與他 1776 年出版的著作《國家財富的本質與原因的探究》(*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此即大家熟知的《國富論》)，明確地提出自由主義對國際經濟的看法。

十七世紀末期法國的**重農主義** (physiocrate) 學者奎耐 (Francois Quesnay, 1694~1774) 首先提出了「自由放任」的看法，他認爲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是有害的。(Balaam & Veseth, 1996: 42-43) 而其主張得到了現代經濟學之父史密斯的回應，他反對重商主義式的國家，更反對國家以安全、生存來干涉市場的運作。在《國富論》中他主張國家是危險的，且不能信賴，相對於國家的權力集中，市場卻是權力分散的。市場中的個人行爲是以「自利」爲出發點，價格是一隻「**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 引導個人做出抉擇，也引導市場發揮機能。因此，其

反對重商主義對國家可調節市場運作的說法，其更認為國家應提供一個法律架構以利市場機能運作。受到「看不見的手」引導的個人自利行為，沒有絲毫要促進公眾利益的意圖，卻往往比以國家利益為目標的國家行為更促進了國家利益，因此他反對國家干涉貿易而主張自由貿易。(Smith, 1970: 400)

史密斯以四點理由來支持自由貿易制度，分別為：第一、從交換現有產品而來的相互利益：交換現有產品雖不能使總生產增加，人們卻在貿易後因為交換到更喜歡、更多樣的不同產品，而使滿足感提高。第二、增加競爭：開放自由貿易後，國內廠商因受到進口品的競爭而無法壟斷市場，便會推出價格更低，品質更好的產品。第三、透過規模經濟與勞力分工來降低成本：史密斯認為國際貿易增加市場的規模和勞力分工，勞力分工又減少成本，而達到規模經濟。第四、更好的利用不同國家的技術與資源：為此史密斯提出了「**絕對利益**」(absolute advantage) 理論，用以解釋自由貿易會更好利用不同國家的技術與資源。

李嘉圖是史密斯經濟學思想體系的繼承者，著作甚豐，其對國際貿易的見解主要見 1815 年出版的著作《政治經濟學與賦稅原理》(*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一書，他對史密斯的絕對利益概念稍作修正，而形成今日自由主義學者對國際貿易的主要看法。

依史密斯的想法，任何一個國家都具有生產某些物品的絕對利益，因此，互通有無的貿易行為才可產生，若今有一國家其在所有的物品生產上都具有絕對利益時，那麼貿易是否無從進行了？針對此一問題，李嘉圖修正了史密斯的觀點，提出了「**比較利益**」(comparative advantage) 法則，他認為，縱使某些國家具有生產所有物品的絕對利益，但是，其他國家仍然可以與之貿易，因為某些國家仍然具有相對利益，專業化的生產不僅對增進各國民的福利有幫助，而且使世界的總生產增加，貿易雙方都得利。其更把史密私有秩序的增長和市場均衡的看法同國際經濟體系相連，以說明當時的國際貿易規則與看法。

在李嘉圖的比較利益法則中有兩個重要的假設。一是完全競爭的法則；二是勞動力是唯一的生產要素，即勞動力的總供給是有限的，要增加某一產品的生產，必須將勞動力從另一種產品的生產中抽離出來。

李嘉圖將絕對利益法則修正後，自由主義學者對國際貿易的基本主張算是成型了，日後的學者也只有做小幅度的修正，而不似重商主義或策略貿易的學者對早期重商主義思潮所為全盤的否認。

從李嘉圖提出了「比較利益」法則後，經濟技術的發展使得比較利益法則的缺陷也就越來越突出了。人們發現，有必要對李嘉圖的兩個基礎假設做出擴大解釋，如產品的進口(出口)時必須考慮運輸成本，生產要素不只有勞動力，尚有資本、技術、管理等等，而且勞動力的概念漸漸被人力資本所取代，成本也被機會成本的概念所取代，另邊際成本與一般均衡理論(the theory of general equilibrium) 也被引進至此一概念中。另外產品的生產不再是單一生產要素的組合，而是多種生產要素的投入，按不同產品的生產要素的投入比例亦不會相同。因此，為了因應此一不同的局勢瑞典籍學者赫克雪爾在 1919 年發表了《對外貿

易對收入分配的影響》一書，提出了如下的觀點。

赫克雪爾認為國與國之間發生貿易的必要條件在於貿易商品生產成本(包括運輸成本)的差異，而成本的差異在於各國擁有的生產資源的相對豐饒(包括要素稟賦)。因此，貿易的形式絕不是取決於李嘉圖所謂的比較利益，而是取決於生產要素稟賦的差異，也就是說，一個國家將輸出它在貿易發生前相對廉價的商品，進口其相對昂貴的產品。若假定貿易國的需求形式相同，那貿易形式唯一的決定因素便在於成本(供給)，即一個國家將輸出相對較多生產要素所生產的產品，而進口需要使用其相對稀少的生產要素生產出來的物品。

在赫克雪爾論文的基礎上，英國籍的俄林更把生產要素稟賦的理論嵌入由洛桑學派(Lausanne School)瓦拉爾(Leon Walras; 1834~1901)所創，並由瑞典籍經濟學家卡塞爾(Gustav Cassel; 1866~1945)所加工的一般均衡價格體系中，建立起考察貿易形式和貿易條件的理論框架。學界將此一模型稱之為「赫克雪爾-俄林定理」，一般簡稱為 H-O 模型；後來瑞典皇家科學院更以其對國際貿易和國際資本流動理論方面做出了突破性貢獻為由，而讓其與另一名學者米德(James E. Meade)共同獲得 1977 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Nobel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

從這個定理可以引出兩個推論：一是生產要素價格均等化的趨勢，另一是關稅對收入分配的影響。前者是說，即使是生產要素在國家之間不完全流動，但國際貿易也可使生產要素的報酬在國家之間會趨於平等；後者是說，由課征關稅所引起貿易額的變動，將提高一種生產要素的收入，而降低另一種生產要素的收入。而 1949 年美國籍學者薩謬爾遜(Paul Anthony Samuelson)在《再論要素價格均等》一文中，對 H-O 模型中所提出的要素價格均等賦予更正確的描述，經由提出嚴格的假設檢證下，生產要素價格均等是必然的，而不僅僅是一種趨勢。因此，有學者把生產要素價格均等定理簡稱 H-O/S-S (Heckscher- Ohlin/Stolper-Samuelson) 模型。

(二) 新貿易理論

克魯曼的新貿易理論(New Trade Theory)認為現今的國際貿易呈現出了下列三種趨勢：第一、資源稟賦相同國家間的貿易額持續擴大。特別是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國家間的貿易幾乎戰了世界貿易總額的一半以上；第二、同一產業內部貿易的迅速興起。同樣是汽車，美國不但自己生產，還從日本、韓國與歐盟進口汽車，而其間的差別主要是其生產的是高耗油的小汽車，而日本生產的是省油的小汽車。兩者屬於同一產業部門，在使用上可以相互替代，但在品牌、消費偏好等因素上又決定了兩者的不同，是相互競爭的；第三、國際貿易不是自由貿易佔上風，而是貿易保護主義。

克魯曼就從此三大趨勢中推演中其關於國際貿易的兩點看法：第一、新的貿易理論必須要研究企業組織對於國際貿易的影響。第二、主權國家所採行的策略貿易制約著國際貿易的發展。

跨國公司企業內部貿易已經是國際貿易的主體，研究國際貿易就不能不研

究跨國公司的企業組織。如設在華盛頓特區的政策研究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NBER）1996年的研究報告即表明，全世界一百個最大的經濟體當中，有一半以上是公司而非國家，其中四十九個是國家，五十一個是公司，全世界兩百大的跨國公司跨至了全球經濟活動的百分之二十八。學者赫斯特（Paul Hirst）與湯普森（Grahame Thompson）便指出，美國貿易約八成是由多國籍企業（multinational company）進行的貿易，這個比例在已開發國家中並非罕見。據估計，在美國的貿易總值中，有高達四成是多國籍企業的內部貿易。（Hirst & Thompson, 1999: 68）。在全球化的今日，跨國公司幾乎已經主宰了世界經濟的命運，成為推動全球化的主導力量。

從國際貿易的新趨勢發展，可以推論出，比較優勢是動態的、是人為的、是跨國公司與國家政策的產物，經濟的規模影響貿易的進行。克魯曼與果斯曼（Gene Grossman, 1992）所提出的「新貿易理論」認為根據遞增的規模報酬與不完全競爭理論證明，若一國使用保護政策製造有利於本國企業在國際和國內市場的競爭條件，將會產生一種「**壟斷利潤移轉**」（shift of monopoly rents）的作用。本國企業將可因此利潤移轉作用在國內與國際市場取得長期的競爭優勢。若這種長期的競爭優勢為本國帶來的正面作用大於短期的社會成本，一國的產業保護政策事實上是對本國是有利的，縱使這種利益是建立在外國福利被移轉到本國的代價上。

史密斯、李嘉圖等古典的自由主義者都是以國家為單位探討國際貿易行為，並且都假定勞動與資本是不流動的，因此，比較利益是靜態的，其只體限於商品的交易中。但新貿易理論卻是以同時在數個國家內生產的跨國公司為理論探討的重點，由於跨國公司在數個國家內的投資行為，因而，其能使資本能高度流動於國際之間。跨國公司根據全球最佳配置原則來按各國資源稟賦條件生產，一種產品因此被分成若干環節在不同的國家生產，每個環節必須緊緊相扣，如此才可完成最終產品的生產。

另外，跨國公司生產佈局又是以最大限度的減少稅收、衝破貿易壁壘、更有效率利用所在國的資源為其佈局的主要思考。而其巨大的規模、全球生產的佈局與隨之產生的企業內貿易，在在都衝擊了國際貿易的格局與全球經濟技術的分布。（Barnet & Cavanagh, 1994）一方面生產與貿易越來越全球化，另一方面少數的全球貿易企業集團把持了一切，全球的經貿活動日亦受到其影響。在過去比較利益的形成是由一國自然條件所賦予，而現在跨國企業經由對某一國投資便可輕易的衝破所在國自然條件所賦予的比較利益，某些國家更利用人為的方式創造的比較優勢，國際經貿的面貌以不同於依賴理論學者所言的中心-邊陲的二分世界了。

（三）自由主義對國際貿易的看法

自由主義對國際貿易的主要看法有三：

第一、國際貿易是**正和遊戲**（positive-sum game）：國際貿易是互惠互利的

行爲，長期而言，它能促進生產效率，並增加貿易雙方之消費水準與實質收入。雖然每個國家由貿易所獲得的利益並不均等，但各國的福祉卻會因爲貿易所得之增加而增加。

第二、貿易的成長能減少戰爭的可能性：國際貿易的成長會帶來國際互賴，因貿易所產生的經濟互賴關係，將能促進國與國之間的相互了解、利益的和諧與合作，並因此有助於國際和平。國家可以藉由比較利益的優勢來專業化生產具有競爭優勢產品，並藉由貿易以較低的成本取得資金、資源與市場，因此衝突的誘因必定減少，各國在考慮到國際貿易帶來巨大的利益時，必將反對必須付出高成本的戰爭，因此，貿易必能減少戰爭。(Buzan, 1984: 597-623) 就如同法儒孟德斯鳩 (Montesquieu, 1689~1755) 所言：「和平是貿易的天然結果」。

第三、主張自由貿易：自由主義學者主張自由貿易，它反對政府對於經濟事務過多的干涉，因此其政策的主要主張是消除貿易障礙，包括關稅與非關稅。

四、有關結構主義的論述

結構主義是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第三種世界觀，它與現實主義所代表的重商主義及自由主義所代表的經濟自由主義並沒有關聯。與重商主義和自由主義所不同的是，結構主義其分析的單位不是以個人或國家爲出發點；而是以「階級」(Class) 與世界經濟，或是「世界體系」(world system) 爲其分析的起點。其思想的淵源來自於馬克思 (Karl Marx, 1818-1883)、列寧 (V. I. Lenin, 1870~1924) 與霍布森 (John A. Hobson, 1858~1940) 的帝國主義理論和許多拉美國家三〇、四〇年代的經驗與許多當代結構主義思想家的觀點。這個學派的中心思想是「結構決定一切」，經濟決定政治，國際經濟的結構決定了個人、階級以及國家的行爲。

(一) 帝國主義

帝國主義 (imperialism) 一詞來自於拉丁文的imperium，意爲指揮、最高權威，而此一詞的涵義亦隨著時代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意義。在十九世紀，帝國主義經常作爲描繪英國擴張殖民主義的意圖與行爲，而在十九世紀末，則常被形容爲一國主宰他國之意。(Cohen, 1979: 10-11) 而本文則採行此一說法即帝國主義是一種信念體系，認爲一個國家爲了軍事安全、經濟利益，而有權去侵略其它國家，進而將其納入本國的統治，而此種意識型態即爲帝國主義。

帝國主義論述代表人之之一的霍布森，他的主要看法見《帝國主義：一項研究報告》(Imperialism : A Study) 一書，這是一部非常具有價值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經典著作。列寧更是明確的承認他受益於霍布森的著作。現介紹霍布森的理論如下：

◎ 霍布森

首先，他對古典經濟學者的信仰提出批判，他與先前的經濟學者馬爾薩斯和其後的凱因斯一樣反對賽伊法則 (Say's Law of Market, 其認爲同等供給行爲的本身能創造同等數額的需求)。他認爲由於財富集中於少數人手中，消

費能力增加的速度趕不上生產能力增加的速度，這些是因為有錢人不願意增加消費與工人實際工資低落的原因，爲了獲取一定的利潤，貨品的價格卻居高不下，以致需求無法與市場所能供給的水準配合。爲了解決生產過剩與利潤降低，資本家只有向外投資，而爲了能取得當地合理的待遇，資本家往往求助政府，因此政府便捲入其中，且只要一國政府捲入其中，他國政府也會陸續跟進形成惡性循環。雖然愛國情緒、傳教熱忱及冒險精神也會導致帝國主義，但只有經濟因素才是導致帝國主義的主要原因，缺少這項因素刺激的帝國主義現象必將萎縮。而其論證的主要核心則來自於馬克思的重要概念——資本主義與擴張兩者間有著內生的關係，而資本主義的擴張必然以帝國主義的政治形式出現，雖然馬克思本人在帝國主義問題上著墨不多，然而，其對資本主義之擴張分析卻在整個後來學者在批判帝國主義中起著極爲重要的作用。(Hardt & Negri, 譯本 2002: 308)

霍布森認爲帝國主義雖然刺激了勞力與資本的利用，但是帝國主義國家可說是得不償失，因爲能享受帝國主義所帶來好處的是一小撮人——資本家，卻反而要整體社會付出代價，除此之外，帝國主義還會造成不良的政治、社會與財政上的後遺症，帝國主義的國家的行爲反而喪失了其優勢的地位。於是，理性的政策制定者因而認識到，作爲獲取財富的方法，簽訂契約應比通過暴力手段的強佔要強的多。(Chilcote, 譯本, 2001: 220-222) 因此，作者主張英國應該停止在海外的帝國主義剝削，而轉到集中建設國內市場，以消費生產出的多餘產品。霍布森對帝國主義的形成做了一種經濟性的解釋，而且其看法影響了許多後來的帝國主義研究者，其中包括列寧。雖然霍布森看見了資本家與人民的利益衝突，但其卻未見到金融資本擁有者與工業主之間的衝突是其理論上的遺憾。

◎ 列寧

帝國主義理論的另一位翹楚非列寧莫屬，列寧對經濟事務的看法主要見於其 1916 年出版的著作《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最高境界》(*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te of Capitalism*)。然而列寧針對帝國主義所寫的著作，其主要內容乃是整理自其他作者所做的分析，並使其內容能夠爲廣大群眾所接受，因此，其並沒有提出任何具有原創性的觀點。而其理論基礎主要還是來自霍布森看法。列寧認爲資本以進入了一個由壟斷所界定的新階段，而其從四方面推論壟斷資本主義的誕生：一是生產集中於康采恩 (combines)、卡特爾、辛迪加 (syndicates) 和托拉斯；二是對原物料來源的競爭性需求；三是銀行寡頭的發展；四是舊的殖民政策發生轉變，富裕的強國尋求在對弱國的剝削過程中擴大經濟利益。而這同時將會導致矛盾的升高，並使平等化產生危機，然而，列寧並不認爲由一個統一的國際銀行所帶來的烏托邦會有出現的可能，也不認爲有一個平穩的資本主義能夠壓抑危機發生。(Lenin, 1917)列寧的目的在於探究事實上的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以便確定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如何進行干預，以促使這個進程有利於社會主義運動的建構。

雖然霍布森對帝國主義的看法大多爲列寧所接受，但其在兩點上與霍布森

的主張不同，一是對於消除帝國主義原始動力的看法，二是關於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看法，現列於下：

第一點的看法兩者差別在於，霍布森認為只要政府採取適當的政策重新分配財富，就有可能消除帝國主義的原始動力。列寧則反對霍布森之說法，他認為只要資本家取得壟斷的地位帝國主義的發展則無可避免。

第二點的看法兩者之差別在於，霍布森認為帝國主義國家雖然會互相競爭而自相殘殺，但是他們也會相互合作，以求取最大的利潤。列寧認為帝國主義國家只會互相競爭，而不會互相合作，就算合作也不能長久。

總的來說，列寧的核心論點是，資本主義國際經濟的確在使世界向前發展，但這種發展卻是不穩定的，由於每個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速度不一，各國權力發展不均衡時，終將導致帝國主義戰爭和國際政治情勢混亂。(Gilpin, 1987, 39) 而列寧的另一個重要的看法在於其將馬克思主義學說中的暴力與恐怖主義的傾向帶進了二十世紀，列寧之所以如此做的原因在於其爲了反對像考茨基(Karl Kautsky, 1854~1938)和伯恩斯坦(Edward Bernstein, 1850~1932)此類的修正主義者。這些人認為，馬克思的一些預見已經錯誤，社會主義的實現並不一定需要透過暴力的手段，通過教育、心理的威嚇(psychological intimidation)與合法的選舉也能達到馬克思所預言的「美好新世界」。

總之，霍布森、列寧等學者以將馬克思主義理論加以引申來解釋國際範圍的政治、經濟現象，將馬克思主義從一種國內經濟理論改變爲一種闡述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國際政治關係的理論。而後的結構主義學者便延續此一架構繼續其理論精神。

(二) 結構主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隨著老帝國主義開始瓦解和許多新國家將要獨立，新的國際情勢開始出現了。因此，許多學者開始修正舊有的理論來適應此依新的情勢，這其中有兩大方向可循，一是修正舊的帝國主義理論，以使其適應新的國際政經情勢。例如跨國公司的出現，它們的資本額已非常龐大，甚至高於若干發展中國家的國民生產毛額；二是對西方現代化理論回應。現代化理論認爲第三世界國家的問題可以通過資本或技術從中心國家向邊陲國家的擴散作用(trickle down)而獲得解決，但這些左翼作家大部分在拉丁美洲，卻對這種看法表示悲觀，他們認爲只有透過社會主義革命的方式，才能實現國家發展。

◎ 依賴理論

依賴理論是在 1960 年代出現，主要學者包括法蘭克(Andre Gunder Frank)，阿敏(Samir Amin)、桑多斯(Theotonio Dos Santos)、卡多索(Fernando H. Cardoso)等。依賴理論提出的背景部分原因是爲了應付傳統結構主義分析和解決方案的明顯失敗，企圖用以解釋拉丁美洲低度發展的現象並建議對低度發展提出解決方案。依賴理論不但一時在拉丁美洲蔚爲風氣，而且更在二戰後蔓延到那

些經濟陷入困境，而政治已開始自覺的新獨立國家中。他們認為低度發展並不是一個暫時性的前資本主義（pre-capitalist）狀態，可以像歐洲、北美與日本等國家終將成為開發國家，而是與資本主義的擴張有著密切的關聯性。他們認為第三世界在國際經濟體系中所處的邊陲地位，是為那些已開發核心國家附屬關係的結果。（Braveboy-Wagner, 1986: 265）依賴理論並不分享世界體系理論長期的水平發展，相反的，他把核心集中於當代核心國家與邊陲國家之間的關係，以及後者對前者不正常的依賴關係。

他們認為，傳統結構主義者的以替代進口戰略實現工業化的主張，未能使低度發展國家實現持久的經濟增長，這是因為低度發展國家傳統的經濟社會條件依然如故，毫無觸動。實際上，進口替代戰略反到加強了當地封建顯要與國際資本主義的**新殖民主義聯盟**（neo-colonialist alliance），其結果是收入分配不合理加深，國內需求不足，無法進行工業化，以及對已開發國家的跨國公司依賴性越來越大，那些跨國公司乘機利用了進口戰略，最後低度發展國家反而更喪失對本國的經濟控制，日益依賴國際資本主義。（Gilpin, 1987: 283; Landes, 1999: 432-433）

◎ 世界體系理論

世界體系理論主張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在擴張循環（cycles of expansion）中前進，而非如列寧所描述的劇烈起伏變化。他們認為擴張與停滯，收縮的長期波浪，是開始於封建歐洲所誕生的資本主義體系。（Wallerstein, 1974）這些循環將從資本主義體系從一個小區域擴至全世界，而列寧所描述的只是接近一個擴張循環的高峰。而華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是融合依賴理論與馬克思主義，並以歷史社會學（historical Sociology）的角度來分析。其相信世界體系是一真實的實體，只有透過對世界體系的全盤分析，才能了解整個資本主義的發展現象。簡言之，世界體系理論重視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歷史動力（historical dynamics），如整合的趨勢、農業商品化、工業化、邊陲化、國際貿易與不平等交換等變數，提供研究一國經濟地位在國際體系上升與下降的現象，流動性的世界體系使得發展的結果免於被決定的命運。（Wallerstein, 1979）

華勒斯坦的理論基本上是屬於新馬克思主義，但融合了現實主義理論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內容。（Dougherty & Pfaltzgraff, 2001: 458）他贊同華爾茲和布爾（Hedley Bull）這樣的現實主義理論者的觀點，認為國際體系的特徵是無政府狀態，國際社會缺乏一個全球性的政治權威。正是這種特徵使得一個管理跨國的資本主義生產成為不可能，結果卻出現由強大的、工業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佔據中心地位的國際分工模式，弱小國家處在邊陲地區，因技術落後故而只能為中心國家提供原物料，半邊陲地區的國家其經濟活動市中心國家與邊緣國家的混合的產物。而依華勒斯坦的觀察，一個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有三個基本要素：

首先，它起源於一個利益最大化原則所統馭的單一市場。第二個要素是一系列具有不同對內、對外強度的國家結構的存在。國家結構的主要功能是——「阻礙」資本主義市場的自由功能，好改善一個或多個團體的獲利前景。第三個

基本要素是，對於剩餘勞動的掌握發生於一個包含三個等級的剝削關係中，這三個等級是---核心(core)、半邊陲 (semi-peripheral) 與邊陲(peripheral)國家的國際層級關係，同時也決定了彼此間不平等的交換關係。

雖然，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這種不平等交換關係，並非一成不變。不過，不幸的，從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發展與擴張來看，發展中國家註定要成為國際分工體系下的被剝削者，因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社會與政治發展方向，自然無法擺脫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巨大影響。

如何從從邊陲國家晉升為半邊陲國家，華勒斯坦認為有三種主要管道：第一、要抓住機會 (by seizing the chance)，必須有一種積極進取的國家機關，如何在核心國家政治地位或經濟影響力變弱時利用機會，也就是在一個好時機突破發展困境，將機會轉變成國家經濟發展利益。基本上，這是可遇而不可求，完全靜觀外部結構的變化，唯一可以把握的是---如何適時地把握著機會，不然機運稍縱即逝。第二、「藉由引進外力，推動國內發展」(promotion by inviation)，與前者所不同之處，乃在於前者發生在國際資本主義經濟面臨萎縮時，而後者處於國際資本主義經濟擴張階段。一般而言，其主要藉由引進外資與技術，利用跨國公司以資助國內的工業發展。第三、是「自力更生的發展方式」(self-reliance)，藉由推行有效的發展策略，追求國家發展的自主性 (economic independence)，減少或降低外力對本國經濟發展策略的干擾與影響，此種發展型態類似於依賴發展，亦或是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的發展型態。(宋鎮照, 1995: 158-2-159)

華勒斯坦對國際經濟的新看法，有助於結構主義者表達下列見解：一是經濟已開發國家衝突的減緩，列寧認為這些國家為了進入開發中國家，將無可避免的引發衝突；但世界體系論者卻看到這些國家雖然持續在競爭，但也發現它們有著相同的利益，諸如尋找低工資、低廉的原料。二是可解釋南北關係持續的差異，與資本主義體系發生世界性的經濟低迷的原因。

法蘭克、桑多斯、阿敏、卡多索與華勒斯坦，其共同特點在於他們改變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分析方式，他們改變了以國家或是以社會的角度來分析資本主義。他們以全球的角度來看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尤其是側重於考察資本主義是如何從中心地帶把各地區編織進此一相互聯繫卻又不平等的世界體系之中，資本的累積過程如何使某些地區發展而使某些地區不發展等等，而他們之間的最大差別在於法蘭克與阿敏把這種差異直接與第三世界的革命聯繫在一起。

(三) 結構主義對國際貿易的看法

總的來說，結構主義對國際貿易有如下的看法：

第一、國際貿易帶來依賴關係：工業先進國家以價高的工業產品來換取開發中國家的初級原料，先進工業國家的跨國公司對第三世界國家進行經濟上的剝削，使得開發中國家無法奠定工業基礎，而且這整個過程是「零和」。如赫斯特與湯普森所做的研究就表明了這一點，其駁斥了只要貿易和投資完全依循市場法則，利益自然會流入不發達國家的觀點，而依七〇、八〇年代的數據來看非但分

配不均的現象沒有改善，反而更加惡化。(Hirst & Thompson, 1999: 75-76)

第二、國際貿易的規則只對先進的工業國家有利：既定的國際經濟結構使得開發中國家永遠處於依賴的地位，惡化了南北貧富不均的現象。

五、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評析及應用

總結本章而論，從民族國家躍上人類的歷史以來，討論跨國界貿易對國家的影響的學術論著，就非常之多。不論是主張重商主義、自由主義、甚至於結構主義的學者，他們對國際貿易都有自成體系的一套看法，但是，這些看法是否就代表了現今國際貿易的全貌呢？我們以為不然。基於研究方法的缺陷，我們認為他們對於國際貿易的看法都有可取，但也都有不足。就如同學者多爾蒂 (James E. Dougherty) 與普法爾茨格拉夫 (Robert L. Pfaltzgraff, Jr.) 就認為我們只是從純粹的理論意義上來對這三種理論加以區別，但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現實中，佔有主導地位的理論可能同時包含兩種以上的理論主張，或是此主導理論可能是這三種理論混合或修正之後的產物，以至於無法分辨其屬於哪一種理論的產物。(2001: 428)

如自由主義思想體系對於貨幣的法則是建立於工業革命初期，若仍然堅持適用於現今的全球經濟體系，則有些食古不化了。傳統的投資組合中的貨幣流通，是國際經濟的穩定器，它們從短期利潤低的國家——因為利率低、股價定價過高或幣值定價過高等原因——流向短期利潤較高的國家，如此使國際經濟維持了平衡，並且，它們同時也會對一個國家的財政政策或經濟條件有反應。但今天的國際貨幣流通則已成為巨大不穩定的因素，它們可能迫使一個國家的經濟走向崩潰的邊緣——如將利率提昇至天文的水平，而扼殺企業的活力，或是一夜之間使貨幣貶值到貿易平價或購買力之下，從而產生通貨膨脹的壓力。又如自由主義學者主張的貿易是正和遊戲，但不可否認的是，四〇、五〇年代若干南方國家的失血性輸出初級產品與國際現實所顯現的關係，都無法說明貿易對所有國家都有利的。重商主義學者所強調的國家經濟的獨立自主是至高無上的條例，因此一個國家必須竭盡所能達到此一目標，但亞洲金融風暴對東南亞與韓國的衝擊更是不可忽視的教訓。³重商主義者更認為一個國家的財富與權力是建立在鄰國的貧窮與衰落之上，但是這些學者似乎沒有注意到，一旦所有的國家都實行重商主義時，世界會變成如何？會變的比較好嗎？因此，對國際貿易的看法更不能掉入單一、簡單原則中。

就長期而言，國際貿易基本上是對整體社會是有好處的，但是，國際貿易卻也會造成尖銳的短期痛苦，例如：美日的汽車大戰、美國與歐盟的白蘭地、雞肉衝突等等。因此，就長期而言，貿易是正和遊戲，但對國家或社會中的某些行業而言，貿易可能是零和遊戲甚至是依賴關係。

³ 學者長谷川慶太郎便認為，韓國的經濟結構過於狹隘，完全沒有分業，基礎過於脆弱，是導致其在亞洲金融風暴中受傷甚重的原因之一，如汽車其零件其自家公司自產率達百分之百，而此一數字在美國是百分之七〇，日本是百分之三〇，見Hasegawa Keitaro著，彭德中譯，《新世紀全球經濟大轉換》(台北：世茂，2000年1月)，頁98-99。

在國際政治經濟學與國際關係的連結上，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應用基本在以下幾個層面，包括：「霸權穩定理論」與「相互依存」在國際關係中的角色及功能；戰後國際貿易體制與戰略性貿易政策之關連；戰後國際金融體制與美元、日元、歐元三者之間的互動演變；跨國公司作為國際關係中新行為者所帶來的意義；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作為外交政策工具之成效；通貨膨脹與債務危機對於國家既有政策之挑戰；南北問題與國際經濟新制度的發展；國際性金融危機對於全球政治社會秩序的影響；全球化時代的政經互動等等，都是國際政治經濟學落實在國際關係中的討論課題，值得讀者們一步地深入了解。

問題與討論：

- 一、何謂政治經濟學？政治經濟學的出現與何種現象相關？而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出現又與何種現象相關？
- 二、重商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礎假設為何？而其對國際貿易的看法為何？
- 三、試述經濟自由主義對國際貿易的看法為何？
- 四、試述克魯曼的新貿易理論？其對經濟自由主義貿易理論的最大修正為何？
- 五、試述霍布森與列寧對帝國主義形成原因的看法與二人對消弭其產生原因的差異？
- 六、試述依賴理論對不發達原因的看法？
- 七、試述結構主義對國際貿易的看法為何？
- 八、試述世界體系理論對世界政經運行的看法？
- 九、假設您是一位第三世界國家發展政策的負責人，您要採用何種方式為自己的國家脫貧致富？
- 十、您是否相信重商主義、經濟自由主義與結構主義所描述的世界經濟存在，請說明理由。

參考書目：

- Staniland, Martin. 1985. *What Is Political Economy? A Study of Social Theory and Underdevelopmen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Balaam, David N. & Michael Veseth. 1996.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 Barnet, Richard J. & John Cavanagh. 1994. *Global Dream*.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Inc.
- Braveboy-Wagner, Jacqueline A. 1986. *Interpreting the Third World : Political, Economics, and Social Issue*.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 Brenner, Robert. 1976. "The Origin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 Critique of Neo-Smithian Marxism". *New Left Review*. Vol.104 (July/August), pp.25~92.
- Buzan, Barry. 1984. "Economic Structure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the Limits of the Liberal Cas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8, No.4 (Autumn), pp.597~623.
- Chilcote, Ronald H. 2000. *Theories of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中文譯本：高戈、高鈺譯，2001，《比較政治經濟學理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 Cohen, Benjamin J. 1979. *The Question of Imperialis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ominance and Dependency*. New York : Basic Book.
- Crane, Geogre T. & Abba Amawi, eds. 1997. *The Theorrtic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 Economy: A Reader*.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enemark, Robert A. 1988. "The Brenner-Wallerstein Debat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32 (March), p.47-65.
- Denemark, Robert A. eds. 2000. *World System History: The Social Science of Long-Term Change*. London, New York : Routledge.
- Dougherty, James E. & Robert L. Pfaltzgraff, Jr. 2001.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 A Comprehensive Survey*. 5th Edition. New York: Addison Wesley Longman, Inc.
- Frank, Gunder G. 1998. *Reorient: 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ilpin, Robert. 198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 Grossman, Gene. 1992. *Imperfect Competi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MIT Press readings in economics.
- Hardt, Michael & Antonio Negri. 2000. *Empi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中文課本：韋本、李尚遠譯，2002，《帝國》，台北。
- Held, David and Anthony McGrew and David Goldblatt and Jonathan Perraton, 2000. *Global Transformations : Politics , Economic and Culture*. London.: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 Hirst, Paul & Grahame Thompson, 1999. *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 2nd .London: Polity Press.
- Hobson, J. A. (John Atkinson) , 1965. *Imperialism: A Stud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Keitaro, Hasegawa 著，彭德中譯，2000，《新世紀全球經濟大轉換》，台北：世茂。
- Kindleberger, Charles P. 1970. *Power and Money: The Economic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New York: Basic Books.
- Krugman, Paul. 1994. *Peddling Prosperity : Economic Sense and Nonsense in the Age of Diminished Expectation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 Landes, David S. 1999.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New York: W. W. Norton.
- Lenin, 1917. *Imperialism :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Maddock, Rowland. 1992.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in John Baylis and N. J.Rengger eds., *Dilemmas of World Politics : International Issues in a Changing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 Ruggie, John Gerard, 1993. "Multilateralism : the anatomy of an institution", in John Gerard Ruggie eds., *Multilateralism Matters: The Theory and The Praxis of an Institutional For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hapter. 1:3-36.
- Smith, Adam. 1970. *The Wealth of Nation*. New York: Penguin Books Ltd.
- Spero, Joan Edelman and Jeffrey A. Hart, 1997.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5th edi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 Staniland, Martin. 1985. *What Is Political Economy? A Study of Social Theory and Underdevelopment* .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trange, Susan 1994. *State and Market*.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 Sylvan, David J. 1981. "The Newest Mercanti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5, No.2(Spring), pp.375~393.
- Taylor, John B. 1995. *Economic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Thurrow, Lester C. 1993. *Head to Head : The Coming Economic Battle Among Japan, Europe, and America*. New York: Warner Books edition.
- Crane, Geogre T. & Abba Amawi, eds. 1997. *The Theorrtic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 Reader*.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Viner, Jacob. 1948. "Power versus plenty as objectives of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 *World Politics*, Vol.1 , No.1 (October) .pp.1-29.
- Wallerstein, Immanuel. 1979. *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allerstein, Immanuel. 1974.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宋鎮照，1995，《發展政治經濟學：理論與實踐》，台北，五南。

進階參考書目：

- Balaam, David N. & Michael Veseth. 1996.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Polity Economy*.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 Frieden, Jeffrey A. & David A. Lake. 1995.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s on Global Power and Wealth*. 3rd ed. London: Routledge.
- Gilpin, Robert and Jean M. Gilpin, 2000. *The Challenge of Global Capitalism : The World Economy in*

- the 21st Centu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ilpin, Robert. and Jean M. Gilpin. 2001.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ilpin, Robert. 198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楊宇光譯，1994，《國際關係的政治經濟分析》，台北，桂冠。
- Guzzini, Stefano. *Re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1998. New York : Routledge. 中文譯本：鄭又平、黃烈修譯，2000，《國際關係與國際政治經濟學》，台北，韋伯文化。
- Held, David, Anthony G. McGrew, David Goldblatt, and Jonathan Perraton. 1999. *Global Transformations :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Isaak, Robert A. 1991.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Managing World Economic Change*. Englewood Cliffs, NJ : Prentice Hall.
- Lipson, Charles and Benjamin J. Cohen. 1999. *Theory and Structur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Rea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Reader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Spero, Joan Edelman. & Jeffrey A. Hart. 1997.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5th ed. New York : St. Martin's Press,中文譯本：楊鈞池、賴碧姬等譯，朱雲漢、高朗等校閱，《國際政治經濟學》，第四版，台北：五南。